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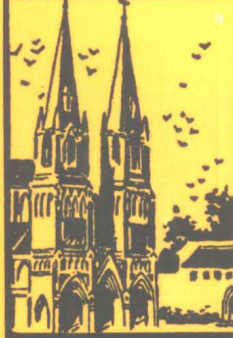
CHUAN
JIAO
SHI



YU



JIN
DAI



ZHONG
GUO



专教

士与

近代

中国

011391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张 臻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增补本)

顾长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2版

1995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5,501—18,500

ISBN 7—208—01192—3/K·277

定价 15.00 元

序 言

宗教是不受海洋和疆域的限制的。世界三大宗教从公元一世纪起都先后传入中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佛教传到中国产生了许多“高僧”，产生了中国自己的各派佛教哲学；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国少数民族特有的信仰，自成一体；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则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来到中国，频频活动，历二百余年，至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新教)的布道者相继踏上中国大陆。随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狂暴袭来，摧毁了中国的固有防线。传教士乘势涌入，上下渗透，步步推进，公然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落，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显然，西方传教士的来到中国，与早年传入中国的那些宗教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也有利玛窦、马礼逊、李提摩太、丁韪良、司徒雷登等大批著名传教士，但是除了前期的利玛窦等有较多的宗教气质外，从鸦片战争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已看不到“高僧”的形象，即使他们中有人自称中国为其“第二故乡”或“半个中国人”，也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中国人民久已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因为：资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

FJ 20/02

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决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是神学的婢女，那末到了近代中国，他们的神学就成了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这个事实也就使中国人民必然要把反洋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揭穿他们的伪善及其罪行。

然而，传教士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别的。为了侵略和传教，他们既不满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又要同封建势力相提携；既要阻止中国的革命，又要用西方科学文化作媒介。所以，他们对近代中国的革新和改良也有所赞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则极端敌视，横加干涉。这些情况，说明了他们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急剧演变中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作为，而他们掀起的无数风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斑斑创伤，却是谁也不能抹杀或改变的事实。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既是传教士，还是有传布宗教的一面，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信了教。吃教和仗势的恶棍毕竟是少数。

一百多年来，我国对西方传教士的行径，有很多记载，也有着很多亲历，却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看到的只有教会及有关人士宣扬《中华归主》一类的传教史和教士传记。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顾长声同志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谈到史学界久已提出应写而没有写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他熟悉教会历史，带着责任心毅然承担了写这本书的任务。在撰写中，改用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为题，以其更能说明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这个特殊方面的内涵和外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日晷夜作，五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本约三十万字的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著中关于传教史的一个空缺。在五稿中，我读过三稿，觉得这本书依次写来，取材典型，文无窒碍，不是近代史加传教的泛论，而是一本有鲜明个性的历史著作：

一、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然后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迄一九四九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并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所构成的段落为章目，既能首尾一贯，重点又较集中。

二、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

三、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又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一般中有特殊，更能显示出教会势力的各种关联和影响。

四、全书从事实出发，史料大多取之于传教士的论著和传记及外国人写的传教史，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言论，现身说法，再以中国的记载印证，一洗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词，给人以信史的感觉。

这本书的问世，无疑将丰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作为“传教士与中国”的专史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蓝图。

陈 旭 麓

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六月

增订版序

这部书自1981年问世后，曾在1983年修订重印。随后，我写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两书分别于1985、1986年出版。此次，我又把《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订再版。

在1985、1986两年，我应美国耶鲁大学之邀请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旅美期间有机会与不少美国学者和教会领袖进行学术交流，受益良多。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和美国圣经会等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热情帮助，为本书的增订工作提供了原始材料，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增订版即将完成前夕，为本书初版作序的陈旭麓先生不幸于1988年12月1日突患心肌梗塞逝世，使我痛失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良师益友。再也不能聆听他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精辟见解了，我只有在今后更加努力工作，以报答他过去对我的关怀。

传教士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有其特殊性。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个课题进行探索，发表了一批极有见地的文章和著作，正在促进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如果我的这本书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便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顾长声

于华东师范大学

1989年元旦

目 录

第一章 传教士的东来·····	1
一 利玛窦身穿儒服上北京·····	1
二 俄国达喇嘛进驻“罗刹庙”·····	17
三 广州外国商馆里的“新客”·····	22
第二章 大炮在天朝呼啸·····	47
一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47
二 从中法《黄埔条约》到“给还旧址交涉”·····	54
三 “传教宽容条款”被塞进不平等条约·····	60
第三章 “洋兄弟”与中国起义者之间·····	69
一 从《劝世良言》的启示到罗孝全的说教·····	69
二 “洋兄弟”来到了太平天国·····	76
第四章 传教团体的组织和活动·····	98
一 天主教修会·····	98
二 基督教差会·····	108
三 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	121
第五章 教案——谁是被告? ·····	126
一 “劝人为善”怎会激起民众公愤? ·····	126
二 重大教案记略·····	136
三 对三个典型教案的考察·····	142

第六章	“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156
一	广学会的成立和它所宣传的西学	156
二	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直接干涉	175
三	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	186
第七章	在脱去道袍之后	195
一	“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195
二	八国联军中新来的“军官”及其暴行	201
三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	213
四	“唯一根治的办法是迅速传播基督教”	219
第八章	传教士开办洋学堂	225
一	洋学堂在中国的发展	225
二	早期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一瞥	234
三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	238
四	同文馆里的洋教习	243
第九章	“为基督征服世界”	247
一	教会势力的大发展	247
二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比较	264
三	李佳白与“尚贤堂”	269
第十章	教会慈善事业	275
一	教会医疗事业	275
二	教会慈幼事业	284
三	教会救济事业	289
第十一章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296
一	记白宫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	296

二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	301
第十二章 应付中国民族觉醒的新措施 ·····	311
一 天主教的“中国化”·····	311
二 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320
第十三章 教会学校的新口号 ·····	333
一 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333
二 从山西大学堂到中华教育会·····	338
三 教会学校提出应变新口号·····	346
四 对三所教会大学的考察·····	363
震旦大学(363)圣约翰大学(367)燕京大学(377)	
第十四章 传教士与抗日战争 ·····	393
一 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	393
二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	399
三 东正教传教士的活动·····	408
第十五章 战后三部曲 ·····	410
一 第一部曲:复兴·····	410
二 第二部曲:应变·····	421
三 第三部曲:撤退·····	425
第十六章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	431
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	431
二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	433
三 《圣经》在中国的传播·····	440
四 《圣经》对中国的影响·····	447
第十七章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	450
一 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450
二 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	453
三 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	457

附录	461
中文参考书目举要	461
外文参考书目举要	467
索引	480

第一章 传教士的东来

一 利玛窦身穿儒服上北京

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利玛窦和庞迪我身穿儒服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受到明万历帝的召见和优礼，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每阅四月，颁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①这是从十六世纪西欧殖民势力东来之后到达中国京城的首批天主教传教士。

自从葡萄牙人同中国开始交通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于一五四〇年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次年，教皇即派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来。他先在日本传教，一五五〇年谋入中国，于一五五二年十月乘船到达广东省沿海的一个名叫上川的小岛，向一中国商人请求用船送他到广州，但被拒绝，不久因病在岛上去世。^②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到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获得明嘉靖帝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后，传教士就接踵而来，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凡入教者都要“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③传教士还

① 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上编，第1卷，第10章，第3节。

② 克罗：《沙勿略传》第2卷，第327,331页。

③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69页。

以澳门为基地，向东南亚一带传教，“澳门已成为葡萄牙在远东势力的中心。而中国、日本和马来亚的传教事业，就以澳门为补给站。”^①传教士还曾多次通过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向广东省中国官员申请到内地去传教，但都被拒绝。

到一五八一年，耶稣会又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到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内地传教。罗明坚先打扮成商人，跟随葡商到广州和肇庆，向地方官吏“赠送厚礼”，试探建立联系。一五八三年，罗明坚偕同利玛窦重至肇庆，向地方当局再次“送礼”，并请求给予在肇庆居住。他们向中国官员“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②传教士的请求终于获得了同意。

利玛窦一人被留在肇庆，但他并没有过“隐居”生活，而是开始了传教活动。为了掩盖耳目，他穿上了和尚的法衣，称教堂为寺庙；为了能吸引人们到教堂，在接待室里陈列了从澳门带来的当时西方所制造的时钟、时晷、浑天仪等物；又在墙上悬挂了一幅用汉文标明地方的世界舆图。利玛窦最初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他故意地“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这正是一种适合于参观者的脾味的地图。众司铎相信，以后在演讲时，一定能有许多便利，来宾见到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得无法测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畏惧有外力来侵略。”^③

一五八九年四月，利玛窦又前往广东韶州传教。后来他又

① 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上编，第1卷，第2章，第1节。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169页。

③ [法]裴化行著，萧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9页。



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

先后到南雄、江西的南昌、江苏的南京和苏州等地活动，并与地方官吏和士大夫结交。利玛窦发现，在他与中国官方和文人交往的过程中，身披和尚袈裟反而诸多不便。于是从一五九四年起，他改穿儒服，戴上儒冠，并自称是儒者。

利玛窦决意要到中国京城北京去，在取得了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同意之后，由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从澳门领来经费和贡品到南京。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利玛窦带了另一传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于一六〇〇年自南京出发，在天津羁留了六个月之后，终于在一六〇一年年初到达北京。通过太监的帮助，受到万历帝的召见。利玛窦于是向万历帝献物。

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

琴、万国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命内臣习学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后蒙赐问大西教旨及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僕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禄，受廩饩。上奉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后命画工图形进览。……利子以旅人浮海东来，观光上国，住中华二十余年，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请命，或两京，或吴越，乞示安插。礼部并为题复，未蒙报可。内官出谕利子曰：弗固辞，主上方垂意。若固辞，则上心滋不喜。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一意京师，偕庞子僦屋以居。至其日用饮食所需，取给于光禄，遵上命也。^①

西班牙首批传教士是在一五七五年到达漳州的，曾要求居留漳州学习汉语和传教，但未获准。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又陆续派遣少量传教士来华活动。^②

十七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势力在海上上升为统治地位之后，第一批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张诚、白晋等五人。他们于一六八八年到达北京，受到清康熙帝的召见并得到任用。最早由耶稣会派遣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是金尼阁，他于一六一一年到达中国。到一七七三年止，先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将近有一百人。

西欧各国在华传教士除一部分在宫廷供职外，足迹遍及中国本部十余省，平均每年约有三十名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传教士的东来，实践证明他们是由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推动，是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据利玛窦自称：

①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78—379页。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431—432页。

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照本会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这精神战争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以后，耶稣会的诸司铎，带着满腔的热情，和葡萄牙人结伴而来。……这种冒险事业，经过了种种阻挠之后，……在华耶稣会长范礼安司铎，决计派几位司铎在澳门学习中文，庶几有一天他们能找到门路进入内地。^①

为了进行这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传教士采取了利用中国儒家经典和介绍当时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利玛窦于一五九五年在南昌刊刻了《天学实义》一书，第一次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此书后改名为《天主实义》，一六〇一年在北京重刻，一六〇五年在杭州又重刻，以后曾再版多次，并译成多种外国文版。现引录该书一段以略窥其貌：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②

① [法]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第1—3页。

② 利玛窦：《天学实义》上卷第2篇。

利玛窦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经籍的话，无非说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是相一致的，以此笼络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他在向万历帝传教时曾说过：“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①后来，利玛窦又编写了《畸人十篇》（一六〇八年）、《辨学遗牍》（一六〇九年）等书，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国经籍。

继利玛窦之后，艾儒略也是大量引用中国经籍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的著作有三十多种。例如在他所著的《三山论学记》一书中写道：

予读中邦史书，见成汤之禘于桑林也，剪发断爪，身婴白茅，以为牺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牺牲，旁观者诚作何状？而汤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悯念斯民者挚也。今天主尊矣，监观下民，非不甚赫，乃尽敛其有赫之威，而受难救赎者，为古今万民也，为予也，亦正为君也。

艾儒略在其他著作如《天主降生言行记略》、《悔罪要旨》、《万有真原》、《涤罪正规》等书中，也都引用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到了清代，南怀仁所著的《教要序论》、《圣体答疑》，白晋所著的《古今敬天鉴》（又名《天学本义》）和孙璋所著的《性理真诠》等书，同样也引用了儒家典籍。

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各省发展教徒，也采用此法以迎合地方士绅的心理，排除传教的障碍，同时容许入教者维持传统的“祭孔祀祖”的习俗。因此，到清朝康熙年间，在华天主教徒已有十五万人左右，其中，耶稣会所招教徒约达十一万人。只是因为传教士内部从一六三一年起发生了所谓“礼仪问题之争端”才使

^①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56页。